

“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笔谈

【编者按】 关涉中国报刊史的学术研究由来已久。自改革开放学术兴盛以来,与中国报刊史研究相关的著述越来越多。随着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报刊史研究的重视,目前在历史学界和新闻传播学界,报刊史的研究日益凸显出学科交叉的特点,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不仅这一学术领域逐步形成了研究热潮,还引发了高层次学者的特别关注和理性思考。借安徽大学、复旦大学举办“第二届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之机,本刊约请到国内历史学与新闻传播学的几位专家学者,请他们就中国报刊史研究的方法论及其相关问题进行讨论。讨论涉及新闻史和近现代报刊史的研究。我们希望通过讨论和争鸣,加深学界对新闻史、报刊史研究的认识,推动和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

报刊与民国思想史研究

郑 大 华

中国人自办报刊是在鸦片战争之后,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得到发展,但这种发展还是初步的,无论报刊种类和销售数量都十分有限。中国报刊业的快速发展是在民国时期,尤其是在五四之后。民国初年,全国的报刊有 500 多种,“仅 1912 年 2 月以后,到北京民政部进行登记,要求创办的报纸就达 90 多种”(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676 页)。二次革命后,尽管因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造成“癸丑报灾”,全国的报刊锐减至 139 种(同上,第 711 页)。然而随着袁世凯的死去,报刊又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特别是五四运动时期,各种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依据胡适的说法,仅 1919 年创办的报刊就有 400 多种。另据《第二届世界报界大会记事录》的记载,1921 年时,全国有报纸 1134 种,其中日报 550 种(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87 页)。此后,报刊的发展更是空前,无论是种类,还是销售量,都远远超过了民国初年和五四时期。有资料表明,仅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及其所领导的政府机构和人民团体在不同时期所创办的报刊,就有 4505 种(李永璞等编:《中国共产党历史报刊名录(1919~1949)》,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全国的大小报刊,总计达 6 万种左右。目前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民国时期报纸有 3000 多种,刊物 10 000 多种(参见李金铨编:

《〈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序》,《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 页)。

在民国时期尤其是五四之后报刊业发展的过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便是思想和学术界同仁刊物的异军突起。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报刊大多是党派或政治团体的报刊,思想和学术界的同仁报刊较少。比如,戊戌变法时期的大多数报刊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创办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虽然是著名的思想家和学问家,但维新派则是一个政治派别,而非思想和学术性团体,他们创办报刊的目的,是为了开民智,宣传维新变法。在 20 世纪初创办的 200 多种报刊中,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创办的报刊就达 120 种之多,虽然各报刊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无一例外都要服务或服从于革命党人的革命斗争,宣传革命思想。与此同时,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保皇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也创办了不少报刊,这些报刊毫无疑问是为保皇或立宪服务的。除了党派或政治团体的报刊外,还有一些纯粹的商业性报刊。和党派或政治团体的报刊“与政治联系紧密”不同,这些商业性报刊,“与政治没有联系,且以不问政治为标榜,专从生意经上打算”(胡政之于 1943 年 10 月 21 日在重庆《大公报》编辑会议上的讲话,转引周雨《大公报史》,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8 页)。但到了民国时期,在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党派或政治团体的报刊以及一些纯粹的商

业性报刊之外,还出现了许多思想和学术界的同仁刊物,如《科学》、《甲寅》、《新青年》、《每周评论》等。粗略统计,这类刊物有数百种之多。

思想和学术界的同仁刊物之所以会在民国时期异军突起,数量剧增,分析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和壮大。尤其是清末派遣出国的留学生,这时纷纷回国,成为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中坚力量,这不仅为民国时期报刊的迅速发展尤其是思想和学术界同仁刊物的异军突起提供了编辑、记者、作者等人才基础,而且这些新式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从欧美回国的留学生,他们深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对于报刊的社会作用有充分的认识,如傅斯年就曾致信胡适说,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既然报刊有如此巨大的社会作用,所以这些忧国忧民的新式知识分子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会很自然地把办报办刊作为一种方式或工具,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主张。第二,进入民国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比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更加尖锐和错综复杂,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也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各个阶级、阶层和各种政治势力及集团,围绕“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主张,并展开激烈复杂的斗争,这为民国时期报刊的迅速发展,尤其是思想和学术界同仁刊物的异军突起提供了现实需要。因为面对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以及中西文化新的冲突和融合,由于政治立场、文化背景、所受教育、社会地位和个人处境等不同,民国时期的新式知识分子对上述问题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主张。为了表达自己的认识和主张,这些新式知识分子往往通过创办同仁刊物而结合成不同的思想和学术性群体。所以民国时期被学术界称之为“什么什么派”的思想和学术性群体特别多(如新青年派、现代评论派、甲寅派、学衡派、新月派、独立评论派等),而维系这些群体的纽带便是同仁刊物(见拙著《民国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 页)。第三,相对宽松的办报办刊环境。民国初年,以孙中山为总统的南京临时政府实行新闻自由政策,人们有自由办报办刊的权利,尽管后来的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甚至颁布“新闻法”、“出版法”、“报刊管理条例”、“报刊检查条例”等,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条规并没有得到全部地认真执

行,社会上还存在着较大的自由办报办刊的空间。此外,民国时期经济和教育的发展,识字人口的增多,也为这一时期思想和学术界同仁刊物的异军突起提供了经济基础和读者队伍。

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报刊比较,民国时期思想和学术界的同仁刊物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首先,从报刊的内容来看。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报刊大多是维新派、保皇派、立宪派和革命派的报刊,这些报刊主要是服务或服从于维新派、保皇派、立宪派和革命派所从事的政治活动(如变法、保皇、立宪或革命),所以它们的一大特色便是突出政论,如戊戌时期《中外纪闻》刊登的康有为的《强学会序》,《时务报》刊登的梁启超的《变法通议》,《直报》刊登的严复的《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等;辛亥革命时期《苏报》发表的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民报》发表的孙中山的《发刊词》、《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新民丛报》发表的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等,在当时都产生过很大影响。但和这些报刊不同,民国时期思想和学术界的同仁刊物,尽管也关心时政,议论时政,甚至针对时政提出过许多主张或建议,但它们更关心的是思想文化和学术问题。胡适就曾表示过,20 年不干政治,不谈政治,要为中国改革打下一个思想和学术的基础。尽管他后来没有践履自己的诺言,但谈起政治来,他更多的还是谈思想文化和学术问题。与此相一致,突出政论不是思想和学术界同仁刊物的特色,思想和学术界同仁刊物的特色在于强调思想启蒙和学术研究。以《新青年》为例,它最有影响的文章是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和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前者宣告了新文化运动的开启,后者是新文学运动兴起的标志。也正因为其关注点不同,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报刊间的争论主要围绕政治问题展开,如戊戌时期的“变不变法”以及“如何变法”的争论,辛亥革命时期的“三民主义”的争论。而到了民国时期尤其是五四之后,报刊间争论的主要是思想文化和学术问题,如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之争”,“白话与文言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新道德与旧道德之争”,“疑古与信古之争”,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之争”,“以工立国与以农立国之争”,“尊孔与反孔之争”,还有 40 年代的“中国特色”之争,等等。就是政治问题的争论,也往往带有浓厚的思想文化或学术争论的色

彩,最具典型的例子莫过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那场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的争论。

报刊内容的这一变化,实际上是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反映。我们一般认为,中国的现代化经历过从物质(洋务运动)到制度(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再到思想文化(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过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国制度现代化的阶段,作为这一时期的报刊,它们理所当然关注的主要是如何变革中国旧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和建立新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问题,亦即变法和革命的问题。而到了民国时期尤其是五四之后,中国的现代化进入到思想文化现代化的阶段。因此,思想启蒙和人的解放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这一时期的报刊、特别是思想和学术界同仁刊物关注的主要问题。

其次,从创办者和作者的知识背景来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报刊的主要创办者和作者有两类,一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保皇派和立宪派;二是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但无论是这两类,或者不属于此的其他办报刊者和作者,他们大多出生于1810至1880年代以前,接受过长期的传统教育,不少人还得到过进士、举人、秀才的功名,后来或通过短期的出国留学(主要是留学日本),或通过上国内新式学堂,或通过自学,对西学有所接触或了解。所以,新旧杂糅、亦旧亦新是他们思想的一大特色。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他们属于新旧过渡时期承上启下的一代,其地位有点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但丁,既是旧时代的最后一位诗人(士大夫),又是新时代的第一位诗人(知识分子)。这种地位和出身,决定了他们既不同于旧时代士大夫,具有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取向,但同时又和旧时代士大夫一样,不以某一领域或学科为自己的专长和职业,是“通才”而非“专家”。而民国时期思想和学术界同仁刊物的创办者和作者,大多出生于1890至1900年代以后,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立宪派和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的学生辈,或学生辈的学生辈,他们中不少人留学过欧美,系统地接受过西方的高等教育,在国外大学取得了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对西方的思想文化有比较系统的了解,并有自己专长的领域(如哲学、文学、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理学、工学等)

和职业(如大学教授、中学老师、报刊编辑、律师等),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以20世纪30年代的《独立评论》为例,在32位社员和主要撰稿人中,有31人曾留学欧美,占总人数的96.87%,其中留学美国者27人,占87%,19人获得博士学位,留学欧洲者4人,1人获得博士学位;6人是理工科教授,26人是人文社会学科教授,其中政治学教授9人,经济学教授5人,历史学教授4人,文学教授和教育学教授各2人,哲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教授各1人(陈谦平:《抗战前知识分子在自由理念上的分歧——以〈独立评论〉主要撰稿人为中心的分析》,李金铨编:《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第148页)。因此,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保皇派、立宪派和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以及同时代的其他办报办刊者及作者的新旧杂糅不同,民国时期思想和学术界同仁刊物的创办者和作者的思想特色是趋新,相对于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西方的近代思想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更多一些。

创办者和作者不同的知识背景,必然会对他们创办的报刊产生一定的影响。就以对西学的译介和理解为例,我们只要比较一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报刊和民国时期尤其是五四之后思想和学术界的同仁刊物就会发现,无论是译介的广度,还是理解的深度,前者都无法与后者相提并论(参见拙著《民国思想史论》,第18~29页)。

再次,从维系报刊的纽带来看。学缘的同门意识和地缘的同乡意识是维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报刊的重要纽带。比如,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保皇派和立宪派的同门意识就非常强烈,他们的报刊大多为同门(即康门)所创办,所主持,非同门之人不得染指。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先后创办的《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上海《强学报》、澳门《知新报》和广西的《广仁报》等报刊,其主持人或主笔、主编清一色的是他的万木草堂的弟子。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从事保皇活动,也指使弟子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南洋和北美创办了一大批保皇报刊。和维新变法时期的报刊一样,这些报刊也基本上由康有为的弟子所负责,是名符其实的“康门报刊”(唐海江:《清末政论报刊与民众动员:一种政治文化的视角》,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0页)。康有为本人对此也从不避讳。

1902年6月,他在给弟子罗璋云的信中,就把保皇派的报刊称之“门人各报”(康有为:《致罗璋云书》,《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9页)。当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保皇派和立宪派在办报办刊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同门的关系,“甚至将门人关系的好坏当作衡量报刊事业成败的关键因素”(唐海江:《清末政论报刊与民众动员:一种政治文化的视角》,第64页)。曾长期追随康有为并受其指派先后担任过《强学报》、《知新报》、《清议报》及《文兴日报》编辑和主笔的徐勤,对同门在办报办刊中的重要作用体会最深,他在致自己老师的信中颇有感慨地写道:“凡办事外人多不可靠,必须同门乃可……今欲办大事,真非同门不能也。盖草堂师弟之谊,数千年所未有。今日之所以能转移一国者,全在此一点精神也。若舍此而破之,无一事能办矣”[《徐勤致康有为》(1903年10月26日),《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31页]。除了只信任同门、只重用同门之外,康有为及其弟子的同门意识还表现在对非同门同户的排挤上。发生在《时务报》内部的康门弟子与章太炎、汪康年等人的冲突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如果说学缘的同门意识是维系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保皇派和立宪派报刊的重要纽带的话,那么,维系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报刊(尤其是20世纪初的头几年)的重要纽带则是地缘的同乡意识。20世纪初,留日学生所办的革命报刊或具有革命意识的报刊几乎都是同乡会的会报会刊,有些报刊名的地域色彩十分明显,如1902年12月创办的《游学译编》,其创办者是湖南留日学生同乡会会员;1903年1月创办的《湖北学生界》(后改名为《汉声》),其创办者是湖北留日学生同乡会会员;1903年2月创办的《直说》,其创办者是直隶留日学生同乡会会员;同月创办的《浙江潮》,其创办者是浙江留日学生同乡会会员;1903年4月创办的《江苏》,其创办者是东京青年会的江苏籍留日学生;1906年11月创办的《豫报》,其创办者是河南留日学生同乡会会员;1907年9月创办的《晋乘》,其创办者是山西留日同盟会会员;1907年11月创办的《粤西》,其创办者是广东留日学生同盟会会员;1907年12月创办的《河南》,其创办者是河南留日学生同盟会会员;1908年1月创办的《四川》,其创办者是四川留日学生同盟会会员;

1908年2月创办的《关陇》,其创办者是陕西留日学生同盟会会员,如此等等。与此同时,国内出版的一些革命报刊,“如《苏报》、《国民日报》、《大陆》、《警钟日报》等报刊的创办者和组成人员,主要是以江浙籍知识分子为主体”。而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的机关报《中国日报》以及遍布于南洋、北美、香港等地的革命报刊,如《檀山新报》(1903年创办于檀香山)、《图南日报》(1904年创办于新加坡)、《广东日报》(1904年创办于香港)、《南洋总汇报》(1905年创办于新加坡)、《中兴日报》(1907年创办于新加坡)、《自由新报》(1907年创办于檀香山)等,其“成员均以广东籍人士居多”(唐海江:《清末政论报刊与民众动员:一种政治文化的视角》,第72、73页)。就是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其内部的同乡意识(主要表现为省界意识)也很浓厚,并形成了以胡汉民、汪精卫为代表的广东人,以章太炎为代表的江浙人和以宋教仁为代表的两湖人这样三个小圈子,这三个小圈子尤其是广东人和江浙人的相互猜忌、排挤,是《民报》乃至同盟会后来发生矛盾和冲突的原因之一。

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维新派、保皇派、立宪派和革命派的报刊不同,维系民国时期思想和学术界同仁刊物的重要纽带不是学缘的同门意识或地缘的同乡意识,而是思想取向或学术志趣的一致性,换言之,创办和主持这些同仁刊物的不是同门或同乡,而是思想或学术上的志同道合者。以《独立评论》的创办人和发起人为例,胡适是学哲学出身,安徽绩溪人;丁文江是学地质出身,江苏泰兴人;蒋廷黻是学历史出身,湖南邵阳人;傅斯年是学历史出身,山东聊城人;翁文灏是学地质出身,浙江鄞县人;任鸿隽是学化学出身,四川垫江人;周炳琳是学法学出身,浙江黄岩人;吴景超是学社会学出身,安徽歙县人;张奚若是学政治学出身,陕西朝邑人。很显然,这些人既不同门,也不同乡,他们之所以能走到一起共同发起和创办《独立评论》,是因为他们都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当时的国际国内问题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看法和主张。由于维系民国时期思想和学术界同仁刊物的重要纽带是思想取向或学术志趣的一致性,而人们的思想取向或学术志趣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个人地位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一旦人们的思想取向或学术志趣发生了变化,同仁刊物也就很难再继续维持下去,或停刊,

或分化,其刊物的创办者、经营者和主要作者往往是各奔东西。五四之后《新青年》同仁之所以会分道扬镳,就是因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了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胡适等人仍然坚守其自由主义立场,反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

二

报刊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已为越来越多的学人所认识。张宪文先生在《中国现代史史料学》一书中曾指出:“报纸是文字史料的一种,也是比较重要的史料,通过它可以看到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张宪文:《中国现代史史料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页)这“各个方面”当然亦包括思想。概而言之,报刊尤其是思想和学术界同仁报刊对于民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有多少资料说多少话,没有资料不说话,这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思想史研究也不例外。有人说,思想史研究主要是理论分析,只要有较强的抽象思辨能力就行,资料的有无或丰富与否都无关紧要。此言差矣!思想史研究确实不同于诸如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军事史的研究,它要求的抽象思辨能力可能更强一些,它要求研究者本人要有思想。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和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军事史等其他历史学科的分支学科一样,离不开第一手资料。理论分析需要建立在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基础之上,没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何来精彩的理论分析?!没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基础的理论分析,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得出的只能是似是而非的观点或结论。

第一手资料对于民国思想史研究如此重要,但民国思想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从何而来?在近代以前,确切地说在没有近代报刊以前,思想史研究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各种出版物,如官修或私修的史书、家谱、方志,尤其是思想家的个人著述、日记、书信,以及一些档案材料(如奏折、上书)等。到了近代,随着近代报刊的出现和发展,报刊成了思想史研究又一重要的资料来源。首先就报纸来看,它除刊登新闻、报道、广告外,还有社论和各种副刊或专栏,这些社论、副刊或专栏的文章,不少就是思想史的重要资料。以民国时期著名的天津《大公报》为例,它不仅每天都有

“社评”发表,就国内国际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且还先后开办过“艺术周刊”、“公开评论”、“科学周刊”、“社会研究”、“医学”、“社会科学”、“现代思潮”、“军事周刊”、“世界思潮”、“社会问题”、“文学”、“文艺”、“经济周刊”、“科学周刊”、“乡村建设”、“明日教育”、“史地周刊”、“电信特刊”、“科学”、“县政建设”、“滑翔园地”、“战国”、“市民与警察”、“工业与科学”、“文史周刊”、“家庭”、“自然科学”、“时代青年”、“电讯”等40多个专业性副刊。这些副刊除少数由报社自己主编外,大多数是约请的社外专家、学者或团体负责主编,如“军事周刊”的主编者是中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蒋百里,“世界思潮”的主编者是对西方哲学颇有研究的著名学者张申府,“社会问题”的主编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梁漱溟,“文学副刊”的主编者是著名学者吴宓,“文艺副刊”的主编者是著名作家沈从文,“文史周刊”的主编者是著名学者胡适,“乡村建设”的主编者是乡村建设研究会。据《大公报》同人周雨的介绍,对于这些副刊发表的文章,报社从不加以干涉,“只要言之成理,有发表价值,就让其各抒己见,但是所有副刊都能遵循统一的主题: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服务,在战时则为抗战救国服务”(周雨:《大公报史》,第184页)。此外,《大公报》还根据需要开办过近50个(次)专刊或特刊,开办过“星期论文”专栏,当时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如胡适、傅斯年、钱端升、蒋廷黻、丁文江、陈序经、梁漱溟、胡道惟、张奚若、罗隆基、王造时、萧公权等,都在“星期论文”上发表过文章,而且他们的很多重要文章是先发表在“星期论文”上,然后再发表于其他刊物或被其他刊物所转载。《大公报》所发表的“社评”和各种副刊、专刊、特刊及“星期论文”上的文章,不仅为我们研究《大公报》史和《大公报》主要创办人的思想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为我们研究同一时期的社会思想或思潮,研究各副刊、专刊、特刊和“星期论文”的主编者、作者的思想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笔者就曾利用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发表的“社评”,写过一篇《理性的民族主义:“九一八”后的天津〈大公报〉——兼与〈东方杂志〉、〈独立评论〉比较》的文章,认为“九一八事变后,在对待日本侵略、国联调停、废止内战等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上,《大公报》都不赞成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当然它也不赞成一些

左翼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提出的与日绝交宣战、反对国联介入等偏激主张,而持的是一种不偏不倚,既不激进也不保守的理性的民族主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理性的民族主义最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郑大华:《理性的民族主义:“九一八”后的天津〈大公报〉——兼与〈东方杂志〉、〈独立评论〉比较》,《浙江学刊》2009年第4期)。其次就刊物尤其是思想和学术界的同仁刊物而言,更是我们研究民国时期的思想(包括社会思想、思潮和思想家的个人思想)不可或缺的资料。比如,我们要研究五四前后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就不能不利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份定期的自然科学期刊——《科学》月刊,据统计,从1915年到1924年的短短9年期间,《科学》月刊刊登的介绍科学知识的文章即达一千多篇,内容从19世纪传统的电磁学、热力学、细胞学、微生物学,到20世纪初开始盛行的X射线、放射性元素、电子三大发明以及相对论、量子论等,应有尽有。这些文章发表后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影响很大。又比如,我们要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当然离不开《新青年》,试设想,假如不利用《新青年》的资料,我们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能否进行下去?就是进行下去,又能否得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回答自然是是否定的。我们要研究20世纪30年代的胡适及其以他为中心的一些自由主义学人的思想,就必然会想到以胡适为主编的《独立评论》,作为一份同仁刊物,30年代胡适及其以他为中心的一些自由主义学人的文章主要发表在《独立评论》上,如果缺少《独立评论》,就不可能对30年代的胡适及其以他为中心的一些自由主义学人的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同样,如果不看《观察》、《新路》、《时与文》、《世纪评论》、《经济评论》等这些抗战后创办的思想和学术界的同仁刊物,要想研究40年代后期中国自由主义学人的思想也就只能是隔靴搔痒。近年来民国思想史研究之所以发展较快,并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术界和出版界加大了对民国报刊尤其是思想和学术界同仁刊物的发掘和整理。天津《大公报》、《益世报》、上海《申报》、北京《晨报》以及《新青年》、《努力周报》、《现代评论》、《学衡》、《新月》、《独立评论》、《观察》等一大批报刊被影印出版,为民国思想史学界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新的第一手资料。这是报刊尤其是思想和学术界同仁刊物对于民国思想史研究之

重要性的第一个方面。

民国虽然只是短短的38年时间,但由于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其尖锐和错综复杂,各个阶级、阶层和各种政治势力及集团围绕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不同主张,并展开过激烈和复杂的斗争。与此相适应,民国时期的思想呈现出“三多”的特点,即思想和学术性群体(亦可称之为“思想文化派别”)多,思想文化和学术争论多,社会思潮多。而这“三多”特点的形成都与报刊尤其是思想和学术界的同仁刊物有关。如前所述,维系思想和学术性群体的纽带是同仁刊物,如以《新青年》为纽带形成的“新青年派”,以《学衡》为纽带形成的“学衡派”,以《甲寅》为纽带形成的“甲寅派”,以《独立评论》为纽带形成的“独立评论派”,以《中国农村》为纽带形成的“中国农村派”,以《战国策》为纽带形成的“战国策派”,如此等等。民国时期发生的众多思想文化和学术争论,大多是在报刊之间尤其是在思想和学术界的同仁刊物之间进行的,如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之争”,争论双方的主要阵地是《新青年》和《东方杂志》;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争论双方的主要阵地是《努力周报》和北京《晨报副刊》;1930年代的“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之争”,争论双方的主要阵地是《文化月刊》和《独立评论》;同一时期的“民主与独裁”之争,参与争论的文章主要发表在《东方杂志》和《独立评论》上。至于社会思潮,更是以报刊尤其是以思想和学术界的同仁刊物为载体而潮起潮落的。学术界一般借用西方学者观点,用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五四后有的人又用马克思主义来代替激进主义)来概括民国时期的社会思潮。我们姑且不论此种概括是否符合近代中国的历史事实(实际上除这三种思潮外,还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复古主义等众多社会思潮),但就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这三种思潮来看,它们都是以报刊为载体而兴起、演变和发展的。

既然民国时期的思想所呈现出的思想和学术性群体多、思想文化和学术争论多、社会思潮多这三个特点都与报刊尤其是思想和学术界的同仁刊物有着紧密的联系,那么,报刊也就为我们厘清民国时期错综复杂的思想谱系提供了可能。比如有学者通过对《努力周报》、《现代评

论》、《新月》、《独立评论》和《观察》等杂志的研究,来梳理以胡适为中心的所谓“胡适派学人群”的自由主义思想及其演变。也有学者在解读《新民丛报》、《大中华》、《解放与改造》、《再生》等杂志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从梁启超到张君勱、张东逊的另一种自由主义的思想谱系。我们要研究文化保守主义在近代中国尤其是民国时期的发展演变,就不能不研究清末的《国粹学报》、民初的《不忍杂志》,五四前后的《东方杂志》、《学衡杂志》和《甲寅周刊》,30年代的《文化月刊》、《复兴月刊》以及40年代的《思想与时代》等刊物,因为这些刊物构成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发展链条。再比如,我们要研究民国思想史上的思想文化和学术争论,就自然离不开对这些思想文化和学术争论的主要阵地——有关报刊的研究。笔者曾先后写过有关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之争”、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之争”和30年代的“中国体位与全盘西化之争”的文章,其资料就主要来源于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些报纸和刊物。这是报刊尤其是思想和学术界的同仁刊物对于民国思想史研究之重要性的第二个方面。

学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那么,怎样才能创新呢?就历史学而言,它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现新的史料,从而弥补以前学术界的研究空白和不足,或推翻、修改、充实和丰富以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二是提出新的观点,对已有的史料或结论做出新的更符合历史事实的解释,从而推进相关问题的研究。人们常说,民国时期的资料汗牛充栋,无法穷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国时期的报刊太多,留下的资料太丰富。另外,民国时期报刊的发行也非常复杂,有全国发行的报刊,也有在某一地区发行的报刊;有公开发行的报刊,也有非公开发行的报刊;有通过各地销售点发行的报刊,也有通过邮局邮寄发行的报刊,还有自办发行的报刊……报刊的发行状况,直接影响到对它的收藏。那些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刊,也许在全国许多图书馆和个人都有收藏;那些只在某一地区公开发行的报刊,也许只在它发行地区的图书馆和个人有收藏;那些非公开发行的报刊,也许很少有图书馆和个人有收藏。由于民国时期的报刊太多,人们穷其一生不可能把所有的报刊看完,加上报刊的收藏情况不一样,有的收藏得多些,有的收藏得少些,有的可能就是很少的几本甚至是孤本,这就为人们发现

新的报刊资料提供了可能。而新的报刊资料的发现,对于推动民国思想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笔者的研究为例。长期以来,几乎所有的教科书或研究性著作都认为,《新月》自1929年第二卷起就批评国民党践踏人权,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自由主义学人批判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最早刊物。实际上,《新月》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批判要晚于《新路》整整一年。尽管1928年年初创刊的《新路》刊行的时间不长,内容却相当丰富:既有知识分子对国内各种政治主张或建国方案的评论,也有其本身的政治要求和社会改造方案;既有对国民政府内政外交的批评与建议,也有对他国政治形势、政体政策的介绍和评价,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存在于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向。但由于《新路》没有经过国民党的审批,是地下非法出版物,加上它只出版了10期就在国民党的高压下被迫停刊,所以图书馆和个人很少有收藏。上世纪90年代中,我在写作张君勱传时,从张氏夫人王世瑛为张写的年谱里得知:1928年年初张君勱与李璜曾在上海合作创办过一份批评国民党的地下刊物《新路》。我便托上海的朋友四处寻找,终于在一家图书馆里找到了这份杂志,并请朋友复印了张君勱发表在该杂志上的文章(当时图书馆不允许全部复印)。后来我根据复印的文章在《张君勱传》一书中加写了“创办《新路》杂志,批评国民党一党专制”一子目,并在学术界第一次提出《新路》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自由主义学人批判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第一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前两年我又得到《新路》所有10期的复印本,于是与我学生合作,撰写出《〈新路〉:大革命失败后批判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第一刊——兼与〈新月〉对国民党专制统治之批判的比较》一文,并应朋友的稿约发表在《安徽大学学报》2010年的第4期上。类似的例子还很多。这是报刊尤其是思想和学术界的同仁报刊对于民国思想史研究之重要性的第三个方面。

总之,报刊尤其是思想和学术界同仁刊物在民国思想史的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我希望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学术界和出版界还应进一步加强对民国报刊的发掘和整理工作,使更多的报刊得到影印出版,以惠及民国思想史研究。

三

以上我们讨论了报刊在民国思想史研究中的地位问题。既然报刊的地位如此重要,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开展对报刊的研究呢?换言之,我们研究报刊的方法是什么?对此,我想以思想和学术界的同仁刊物为例(因为思想和学术界的同仁刊物,其思想史意义比其他类型的报刊可能更大一些),并结合自己的研究实践,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我认为,研究报刊首先要研究报人与报刊的关系。这里所讲的报人,主要指的是报刊的创办者、经营者和作者。因为报刊是由人创办和经营的,报刊的性质往往由创办者(个人或思想和学术界群体)和经营者所决定,如果创办者和经营者的政治、思想或文化取向上激进,那么,他们所创办的报刊在政治、思想或文化上往往也是激进的;反之,如果创办者和经营者的政治、思想或文化取向上保守,他们所创办的报刊在政治、思想或文化上往往也趋于保守。比如,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人是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所创办的《学衡》也是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刊物之一;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大师”,他所创办或主持的《努力周报》、《新月》和《独立评论》被学术界公认为是自由主义刊物;陈翰笙、薛暮桥、钱俊瑞、孙冶方等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们所创办的《中国农村》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方针、政策,批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重要阵地;杨公达、萨孟武、梅思平等人是南京中央政治大学的国民党籍教授,他们所创办的刊物《时代公论》代表的是国民党内非当权的知识分子的声音,如此等等。创办者和经营者不仅决定着报刊的性质,有时还决定着报刊的宗旨方针、经营方式甚至栏目设计。比如,胡适等人在创办《独立评论》时,为《独立评论》确立的宗旨是:“期望各人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就是独立的精神。”(胡适:《引言》,《独立评论》第1号)张季鸾为天津《大公报》确立的办报方针是“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所谓“不党”,即不倚附于任何党派;“不卖”,即不为金钱从事利益交换;“不私”,即不为了一己为了一小团体的私利;“不盲”,

即不盲从,不附和,有自己的独立立场。无论是对《独立评论》,还是《大公报》,尽管人们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评论,但实事求是地讲,它们基本上还是坚守住了其创办者所确立的办刊宗旨或办报方针。总之,一份报刊办得如何,与其创办者和经营者有着莫大的关系。戈公振在他那本被视之为中国近代报学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中国报学史》中就指出:“报馆譬之人体,人材则灵魂也。故报纸之良不良,可自其人材多寡知之。”(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98页)戈公振在这里所讲的人材,主要指的是总经理、总编辑等这些报刊的创办者或主要经营者。

除创办者和经营者外,作者对于报刊的影响也非常之大。大众传播学告诉我们,大众传播产生影响的因素有三个,即受众、传播者和媒体。这三者的关系是:媒体传播的内容和形式是影响受众的直接原因,受众不能从媒介中得到媒介中没有的东西。决定媒体传播什么内容并以什么形式传播,则是由传播者、传播职业的传统和规范、传播机构以外的因素如法律政策法规、广告商、内在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决定的;而一定形式媒体将产生什么影响,则与受众的内在条件有着重大的关系(卜卫著,刘晓红译:《大众传播心理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一份报刊的社会影响及其地位如何,最终是由它所刊载的文章决定的。《时务报》之所以在当时影响很大,关键在于其发行点由十几处迅速增至100多处,发行地区由沿海大城市逐渐扩展到云、贵、川、甘一些边远省份和潍县、沙市、瑞安等中小城镇,销售量最多时达到17000多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吸引众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为主笔的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变法通议》、《古议院考》、《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知耻学会序》、《西学书目表后序》等系列文章,不仅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维新变法的必要性与必然性,并且从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方面对封建制度进行了批判,介绍和宣传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民权、平等思想,而且梁“纵笔所至不检束”,“笔锋常带感情”,其文字“平易畅达”,“条理明晰”,令人耳目一新,具有很强的感染力。《独立评论》从一个由“八九个朋友”创办的小刊物,迅速变成为“全国人的公共刊物”和“舆论中心”,发行量达到一万三四千份,其原

因之一(或主要原因),就在于它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作者群,除了胡适外,当时在思想和学术界有一定或较大影响的人物,如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任鸿隽、吴景超、张奚若、萧公权、张佛泉、陈序经、钱端升、罗隆基等,大多为它写过文章,是它的主要作者。

既然创办者、经营者和作者直接关系到报刊的性质以及报刊的文章内容、经营方式,甚至栏目设定,因此,我们研究一份报刊,首先要研究它的创办者、经营者和作者,其中包括创办者、经营者和作者的教育背景、政治立场、从事职业、社会地位、生活经历以及交往圈子等。比如,我们要研究《独立评论》,那就必须研究胡适以及《独立评论》社的原始社员和它的主要作者;要研究《学衡》,当然就得下功夫研究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人。否则,我们所谓的报刊研究,就难入其门径。

其次要研究社会与报刊的关系。任何报刊都是一定社会的产物,或多或少会带有它存在时期的社会烙印。比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报刊,无论它保守还是激进,都会涉及维新、立宪或革命的问题;五四时期的报刊,不可能不关注新文化运动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各种思想文化争论,只有态度不同而已,或支持参与,或反对批评;20世纪30年代的报刊,民族危机以及如何挽救民族危机是其重要的话语之一;抗战时期的报刊,必然会聚焦抗日战争。换言之,报刊的话语或内容,是与它所处的社会紧密联系着的。因此我们研究报刊,要研究它产生和存在时期的社会背景,研究报刊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所谓报刊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简而言之,即报刊如何通过舆论来影响社会,而社会又如何影响着报刊来调整自己的办报办刊方针、刊载内容和栏目设计,以便争取更多的读者。民初著名报人、长沙《大公报》主笔龙兼公曾就报纸与舆论的关系作过说明。他说:报纸和舆论的关系,“约可分作三种:(一)报纸创造舆论。(二)报纸代表舆论。(三)报纸改革舆论。第一项是舆论由报纸创造出来,换一句话说,便是报纸发表某种新思想新主张,得群众的赞同,渐渐制成了一种舆论。这种舆论是从来没有的,所以说是创造。第二项便是社会上有某种舆论,报纸于适当机会替他宣布出来,有时加以批评表示赞助的意思。报纸替舆论作喉舌,所以说是代表。第三项便是报纸认

为某种舆论有错误或不妥当不适宜之处,把他纠正起来,结果居然告了成功。这个与创造的性质稍有不同,所以说是改革”(龙兼公:《报纸和舆论》,长沙《大公报》“评论”,1919年8月15号)。龙兼公所讲的报纸和舆论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报纸与社会的关系。因为如前所述,报刊影响社会靠的便是舆论。这只是就报刊影响社会一面而言。从社会影响报刊一面来看,也是如此,报刊往往会根据社会需要而增设栏目、改革内容,甚至改变办报办刊方针。借用台北学者曾虚白的话说:“传播事业是带着社会步步高升,同时社会的进步又培养传播事业发挥它更大的效能,如此互为影响,生生不已,而构成多采多姿的社会形态。”(曾虚白:《中国新闻史》,台湾,三民书局1984版,第4页)

民国时期的报刊都非常重视与社会的互动。比如,《新青年》从第1卷第1号开始,即设置一“通信”栏,刊登读者的来信和编者的复信,从而为读者与编者之间的自由讨论提供了一个平台。据学者研究,《新青年》前后共刊发读者来信194封,如果加上编者的回信,共400多封(有时一封来信有三四封回信),这些来信和复信涉及到青年问题、《新青年》宗旨、文学革命、孔教、汉字改革、世界语、中国戏剧改革、妇女解放、时政评论、工人劳动、社会主义以及对《新青年》的建议等一些当时社会比较关心的思想、文化和社会问题。“用‘媒体传播学’的眼光来看,这是一种为‘制造舆论’和‘动员舆论’而设置的专栏。这个专栏,一方面,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自由讨论、自由对话的平台;另一方面,它也把刊物作为‘媒体’的功能,在当时的情况下发挥到极致”。编者与读者,或者说刊物与社会所形成这种思想、论题的互动,“反映了中国近代公共舆论的初步形成”(杨琥:《〈新青年〉“通信”栏与五四时期社会、文化的互动》,见李金铨编:《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第66、47页)。和《新青年》一样,民国时期的许多报刊都开设有“通信”或“来信”以及其他类似栏目。这是报刊影响社会方面的例子。社会影响报刊方面的例子,我们可以举民国初年龙兼公任主笔的长沙《大公报》。为适应不断变换的社会思潮,满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需要,长沙《大公报》不仅开辟或更新了大量专栏,如开设“介绍新知”和“新思潮”专栏、更新“胜闻”和“艺海”专栏,并增设“现世思想”副页等,而且还不断

改进文风,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发表新的文学作品,为新文学的爱好者提供阵地。通过这些措施,长沙《大公报》不断获得生机和活力,从一份小报,逐渐成熟和壮大起来,成了当时湖南最有影响的民营报纸[喻春梅:《长沙〈大公报〉与民初湖南社会思潮(1915~1927)》(未刊稿),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2008年博士论文]。实际上,一份报刊办得成功与否,与它能否实现和社会的良性互动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

再次要研究报刊与报刊的关系。这包括两层涵义。一是报刊间的相互关系,比如,报刊之间文章的相互转载、作者的相互流动、发行渠道的相互利用,以及相互的批评与争论等。二是报刊之间的相互比较。我一直主张研究思想史要用前后左右比较法。所谓“前后”比较,也就是纵向的历时性比较;所谓“左右”比较,也就是横向的共时性比较。只有通过与同类人物、事件、思想、思潮、报刊的前后左右比较,才能更好地说明其研究对象的地位、作用、特点及价值。因为有比较,才有鉴别。以上世纪30年代为例。当时有四个比较有影响的刊物,一是《独立评论》,二是《再生杂志》,三是《复兴月刊》,四是《时代公论》。这四种刊物分别代表了四种不同的政治力量及其主张。《独立评论》是胡适等人创办的,代表的是非党派的自由主义学人及其主张;《再生杂志》是张君勱、张东荪等国社党人创办的,代表的是介于国共之间的中间党派的自由主义学人及其主张;《复兴月刊》是以黄郛为会长的中国建设学会创办的,代表的是国民党内不当权的国民党人(很多是老同盟会会员)及其主张;《时代公论》是杨公达、萨孟武、梅思平等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的教授创办的,代表的是国民党内不当权的知识分子及其主张。作为九一八事变之后才创办的这四种刊物,它们都非常关心民族危机,关心中日问题的解决,并积极参与了有关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讨论,但由于所代表的政治力量的不同,它们对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主张也有所不同。只有通过对这四种刊物的比较,我们才能发现它们之间的

同与不同,也才能对这四种刊物的历史地位做出比较合乎事实的客观评价。

除要研究报人与报刊、社会与报刊和报刊与报刊的关系外,我们还应研究影响报刊的其他因素,如经费来源、发行渠道、销售情况、内部机构等。以经费来源为例,经费由谁出,往往会影响到报刊的性质和办报方针。民国时期的不少报刊,尤其是思想和学术界的同仁刊物,为了维持报刊的独立性,一般不接受党派、团体和商人的津贴或赞助,经费主要靠自筹、广告和销售来解决。比如,《学衡》出版经费主要是靠杂志创刊时的原始社员每人出一百元作基金来解决,当时任北洋政府部长的章士钊曾表示愿资助1000元作为杂志的补贴,被拒绝。尽管后来经济上遇到了很大困难,但为了维持政治上的独立地位,主编吴宓宁愿自掏腰包和向亲友募捐借贷以维持刊物的正常运行,也不接受官方或商人的资助。《独立评论》的开办费,也是由原始社员每人拿出薪水的百分之五解决的。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受天津《大公报》之初,三人即约定:办报经费由吴鼎昌一人筹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捐或集资,也不接受官方的任何津贴;三人专心办报,在三年内都不许担任任何有俸给的公职。这后一约定不久又成了所有报社成员都必须遵守的规定。1936年吴鼎昌到南京做国民政府的实业部长,在去南京之前,吴登报辞去《大公报》社长一职。正因为经费来源、发行渠道、销售情况、内部机构等都会影响到报刊的存在和发展,所以戈公振在写《中国报学史》时,就专门写了一章(第六章)“报界之状况”,分别介绍“报馆之组织”、“新闻”、“广告”、“发行”、“销数”、“印刷”、“纸张”、“用人”、“附刊和小报”等情况。

收稿日期 2010—10—10

作者郑大华,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北京,100006。